

社會/文化史集刊：

台法霸權史學八十年



盧建榮 / 主編

文化史集刊

台、法霸權史學八十年

盧建榮 主編



社會/文化史集刊：臺、法霸權史學八十年/

盧建榮主編.- 台北市：時英,2009.11

面：公分

ISBN 9789866653360 (平裝)

1.史學 2.文集

607

98022019

社會/文化史集刊：臺、法霸權史學八十年

主 編：盧 建 榮

出 版：時英出版社

地 址：台北市新生南路 3 段 88 號 3 樓之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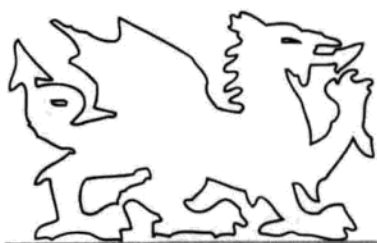
登 記 證：局版合業字第 2944 號

電 話：(02) 2363-7348 236348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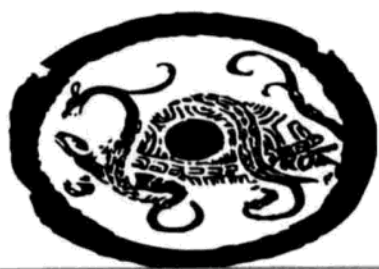
價 格：新台幣 350 元整

出版日期 2009 年 11 月初版

I S B N 978-986-6653-36-0



- I -



本集主打



社會／文化史集刊：台、法霸權史學八十年

2009/11 (november, 2009)



社會／文化史集刊 第一輯
台、法霸權史學八十年

目次

☐ 本集主打

.....PI

汪榮祖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對安娜史學八十年（1929-2009）的回顧與反思

.....P1-8

盧建榮

搶救邊緣：象牙塔外與黑風寨內

.....P9-50

☐ 名家文萃

.....P51

侯杰 陳曉曦

事件、文本、解讀——以民國時期“雙烈女事件”為中心

.....P53-76

賴建誠

都鐸王朝經濟結構的三個基本面貌

.....P77-107



□ 新秀試刀集

.....P109

江政寬

歷史與敘事：中西比較

.....P111-135

湯瑞弘

柯靈烏論歷史證據

.....P137-174

陳建守

姣紫嫣紅：明清牡丹花文化的建構與論述

.....P175-200

陳明治

崇儉論述的難題——以興建明堂爭議事件為探討中心

.....P201-226

□ 思維激盪專區

.....P227

蔣竹山

植物、醫學知識與消費文化：前近代東亞的人參史研究的新取向

.....P229-263

林文玉

試論台灣學界對台灣後殖民現象的研究情況

社會 / 文化史集刊：台、法霸權史學八十年

2009/11 (november, 2009)



.....P265-288

謝柏暉

文化史中的語言與實踐：從懸崖邊緣退卻

.....P289-304

☐編輯後記

.....P305-307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對安娜史學八十年（1929-2009）的回顧與反思

汪榮祖*

一九七六年的秋天，我曾在台北出版的《食貨》（6卷6期）上發表一篇介紹當代法國史學的文章。當時的法國史學名震遐邇，成為重要的典範。其所出創刊期刊為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社會經濟史學報），世人遂以 *Annales* 簡稱此一學派。然而 *Annales* 乃學報或期刊之意，無法直譯為中文，所以我選擇了音譯，稱之為「安娜學派」，但並未被漢語世界所接受，不知何人始作俑者，譯之為「年鑑學派」，居然風行流傳，但名實不符。事實上，年鑑正是此一學派最瞧不起的歷史書寫方式，以此名之，豈非一大諷刺？筆者堅持原譯，絕非泥古不化或標新立異，實不得已也。

安娜學報創刊於一九二九年的一月十五日，至今即將八十年。八十年前的秋天，全球爆發了空前的經濟危機，經濟蕭條更加激化社會問題，以社會經濟史標榜的安娜學報，問世於危機之秋，卻適逢其時，將歷史研究的重心從政治移向經濟；在方法上，也趨向由社會科學取代實證史學，於是盛極一時的蘭克史學遭到挑戰與拒斥。其實，早在1903年一位年輕的法國社會學家斯彌安(Francois Simiand)撰寫了〈史學方法與社會科學〉一文，嚴厲挑戰蘭克的法國門人塞若坡(Charles Seignobos)的史學方法，強烈要求歷史學家撥雲霧而見青天，接受社會科學的方法治史，將重點從個人轉向

*國立中央大學講座教授，文學院人文中心主任



社會，無異給史學家上了一課。登載這篇頗具挑釁意味文章者就是安娜學派兩位創始人之一費佛（Lucien Febvre）。費佛及其伙伴布勞克（Marc Bloch）不僅勇於接受挑戰，而且腳踏實地帶領史學向社會科學進軍。

被視為科學治史的蘭克實證派史學對法國的史學影響很大，也成為當時法國史學界的當權派，所以安娜必須挑戰主流，力破以政治史為導向的敘事史，以便拓寬史學的視野，尤重社會經濟史，最後成功地將社會科學引導到學派的旗下。社會科學包括地理學、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人類學等學門，影響所及，講究議題導向（problem-oriented technique）的歷史書寫。重視社會經濟問題不免會受到馬克斯唯物史觀的影響，費佛與布勞克也多少有社會主義者的傾向。他們不以古還古，而是以今論古，如布勞克從其目睹的農村進而研究中古時期的法國農村，認為古今之間有緊密的有機關係。標榜社會與經濟現象的安娜學報未久即改變了史學的論述，捨棄敘事而從問題中探索歷史，由問題架構形成「結構史」（structural history）的概念。一方面對歐洲不同社會作比較研究，另一方面研究心態，解開心性世界之秘密，開展「心解史」（psychohistory）的可能性。費佛更具體地將情緒、愛情、死亡、憐憫、殘忍、喜悅、恐懼等等，作為心態研究的議題。不過，布勞克更注意社會經濟議題，旁探「歷史人類學」（historical anthropology），對禮儀、迷思、信仰等較感興趣。於此可見這兩位安娜學派的創建者都努力將歷史作為社會科學之一學門，然而必須指出的是：他們並不出主入奴，將史學臣服於社會科學，而是將其為我所用，一出手就有運社會科學於史學軌道內運轉的豪情。安娜的創始者並無意要去發現歷史的規則，費、布兩人有所創新，也能守成，未棄史學之本。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慘烈對西方史學意識的衝擊，更甚於歐戰。以歐洲為中心的國別史論述不再能應變新的世局，拒絕狹隘的國別史之餘，須尋求新的方向，而安娜學報正趁時而興，改名為《經濟社會文明學報》（Annals: Economies, Societies, Civilization），去掉「史」字，以示更加傾向社會科學，



而無論經濟、社會、或文明都以複數表達，進軍國際，誠如義大利著名史學史家莫密葛利阿諾（Arnaldo Momigliano）於一九六一年所說，安娜學派已經取代先前德國史學在歐洲的主導地位。

統計學與量化使經濟史更為興隆，史家熱中於人口學、經濟發展的曲線、以及社會關係分析。社會科學的突飛猛晉為史學研究的轉向增添動力；不過，過於強調經濟力的互動，不免掩蓋了人文因素。於是，繼費佛與布勞克而起的布岱爾（Fernand Braudel）力言歷史意識之不可輕忽，力圖避免歷史的社會科學化，而使社會科學為史學所用，消除兩者之間的藩籬，更將史學研究的重點從社會推向文明，以冀重建全球性的人文現象。一言以蔽之，布岱爾史學之視野，至為開闊，他借重社會科學的「結構」概念，但以史學為主，他有意建立以史學為主的社會科學「共同市場」，並將之綜合而成為以全球為視野的論述，產生彼此互動的科學。分時間為三面向：地理時間、社會時間、個人時間，不廢具體的史實，而將歷史置於綿長的時間與廣大的空間之中，作比較研究。他高度重視歷史環境與地理因素也就不足為異，地理因素使他因強調長時間而不得不減輕人文的份量，使人失去了歷史的主導地位。人受制於空間，在大自然的偉力之下顯得十分脆弱。

布岱爾不僅是一位有眼光的歷史學者，而且極能辦事，研究需要錢，但他不受美國基金會的約束，展示了學術領導的才能，可說是安娜學術帝國的重要締造者。在學術上，他有統合社會科學於歷史的雄心壯志。當安娜於一九七九年慶祝五十週年時，布岱爾集費佛與布勞克兩人之志業於一身，鞏固了學派「在理論與制度面的地位，更要把研究成果呈現給更多的讀者。他本人的成果從歷史地理到經濟結構，到世界經濟概念，省思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成為學派的巨人；不過，他謙稱只是追隨先賢的蹤跡。

布岱爾為奪社會科學之先聲，建構長時間的「結構史學」（structural history），不免以「常」掩蓋了「變」，幾乎看不到歷史的發展，人文好像難



逃結構之網，雖未消失於無形，畢竟被邊緣化。但是安娜史學絕非停滯在有常無變的空間之中，不作調整。他們固然始終下視政治事件，始終借重社會科學，始終以問題意識治史，始終標榜自樹的風格，講心態而不講意識型態，講物質文化而不講唯物主義，講結構而不講辯證。

回顧八十年來安娜史學的發展，也不難看到一些負面的後果：一是看不到人在歷史的前沿，似乎變成了「無人之史」(history without people)，幾不見了與人密切相關的傳記、政治史與事件；二是歷史脫離了現實，只管中古、近古，好像遺忘了二十世紀，不再成為當代的鏡子；三是史學知識的解構，只見眾多的微觀史研究，減少了安娜原有宏觀視野。社會科學無疑滋潤了史學，但也不免使史學自失立場，喪失自我。不過，安娜在二十世紀西方史壇佔有特殊重要性的學派，具有應變的能力；事實上，八十年來四代史家曾不斷地適時應變，從地理的以及經濟的歷史轉向人類學的以及心態的歷史。安娜想把歷史儘量「科學化」，故強調量化之重要，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安娜史家拉督瑞(Le Roy Ladurie)所寫的 *Peasants of Languedoc* (《郎古度的農民》) 一書，標示量化研究達到至高點，但這位第三代安娜史家同時以敘事重建 1580 年新教徒屠殺天主教徒事件，使歷史之中重見人與事。九年之後出版的 *Montaillou* (蒙他猶) 更出現個人生活的細節以及小村百姓的思維與行為。安娜第四代史家的研究方向又有所調整，甚至連期刊的名稱也於 1994 年改為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史學，社會科學》)，研究方向與資料採集更趨多元化，更加鼓勵細密的質化思維。為了不要完全臣服於社會科學，加強與文學以及人類學的聯繫。若視安娜為一學派，此派略無門戶之見而具不斷求新的精神，一直抱著開放的胸懷，探索新方法與新途徑，益之以健全的組織、幹練的學術領導人，使安娜史學在八十年之年，仍然興盛不衰。

安娜學派於八十年前一起步就超越了蘭克的實證派史學，著力於經濟社會史之研究，亦反映史學與時代的密切相關。在方法上，不僅借重社會



科學，而且有以史學統合社會科學的雄心壯志。反觀一直追隨西方現代史學的華文世界，所走的路與此一西方重要歷史學派，何其不同。中國現代史學的重要領導人傅斯年於八十年前，仍然帶領史學工作者走實證之路，一方面將史學等同史料學，另一方面又要建立科學的歷史，他心目中的科學是自然科學，顯然想根據充分的史料將史學建設得像生物學、地質學一樣的科學。傅氏的老師胡適之也認為科學就是自然科學，胡氏於五〇年代末在臺大法學院的大禮堂裡講史學方法，大談化學，筆者亦曾在濟濟一堂的人群裡洗耳恭聽，教我們史學方法的姚從吾教授入場較晚，沒有座位，只好擠到講台前，面對胡適，站著聽講，並勤作筆記。但談這種科學的歷史無異水中月、鏡中花，不可能有意義的結果；科學的史學既未能建立，而史學已淪為史料編輯學。這些史家認為史料自己會說話，以為編排資料就是研究。同時在政治的高壓下，整理與編排史料也足以成為史家的「避風港」。

安娜史派的重中之重是社會科學，但誠如唐德剛在《胡適雜憶》中所說，胡老師的社會科學一直停留在赫胥黎(Thomas Huxley)的層次，對於安娜所致力之經濟社會史的知識是「一團漆黑」，傅斯年的社會科學知識諒與乃師在伯仲之間。史學家兼台大文學院院長沈剛伯先生曾於一九五八年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成立四十週年紀念會上作了以〈史學與世變〉的演講，明確質疑所謂「史料學派」，說是史料無法求全，也不盡可靠，所以「史學很難成為純粹的科學」，清楚地否定了傅斯年所倡導的史學即史料學，此一演講稿後來發表在史語所集刊第四十本上。但沈氏「否定」傅氏之餘，並無創見。沈先生也不懂社會科學，就在他這篇演講稿裡，說是經濟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的「科學基礎還沒確立」，「所以我們現在還沒法子使人類的歷史也同自然界的歷史一樣，成為一門完全信而有徵的科學」，實在有點不知所云。事實上沈先生一直是史學界一位重要的領導人，在威權體制下，他所受的壓力很大，威權體制要他帶頭學以致用，在蔣公領導下為反共抗



俄大業盡一份心力，沈先生的演講未嘗不是對壓力的表態，那一期史語所集刊封面印有「恭祝 總統蔣公八秩晉二華誕」字樣，恐非巧合。然則，我們的史學領導人學識既有不足，又遭遇到外在的政治壓力，安能像安娜之自由飛翔，形成現代史學的一大門派。

直到一九六、七十年代，主要由於留美學習歷史的若干學者回到台灣，介紹了一些當時正在西方興起的社會史研究，以及社會科學方面的若干知識；然而由於社會科學的根底淺、底子薄，當年在台大教社會學的陳紹馨還在講「七寶之身，五漏之體」云云。留學生的譯介既無系統，也不夠深入，據王晴佳在《台灣史學五十年》所說，真正能運用新的社會科學方法研究歷史的，並不太多。若所云不虛，則又如何落實社會科學史學之興起？

在華人之中，利用社會科學治史最有成就的是何炳棣教授，無論有關近世中國歷史人口，明清社會流動，或農業以及文明的起源諸議題，不僅規模大，而且份量重，只是何教授的專書與論文大都用英文發表，近年才有一些翻譯本出現，對整個華語史學界未見應有之大，華語史學界也未見可以匹敵之作。今日可見的社會科學史學華文專書或論文，皮毛多於實質，數字圖表雖然整齊，往往議題失焦，流於無謂，而文字枯燥乏味更屬尋常。

我們是否也有學派？時而聽聞有所謂「南港學派」之說，南港一地原屬台北之鄉野，然自五十年代起匯聚了不少歷史學者，勤於研讀自大陸播遷來的大批史料，並勤加整理編纂成書，可說是承繼史料學派之餘緒；並忠於記事，條列整齊，實承大事編年之傳統。就此而言，倒是名符其實的「年鑑學派」，只是南港學派之名不出島外，不列國際學術之林，即在島內似乎也未被重視，而年輕一代的南港史家也未必以史料自重，亦不以繼承傳統為念，大多追隨西潮，無論選題與書寫方法與前輩迥異，也不盡為前輩認同，整個史學發展之方向，似乎尚無定見。



今值安娜成立八十週年，其成長之軌跡可尋，聊作一文，略作回顧，藉以自省。他山之石，或可攻錯也。

汪榮祖

2008 年 11 月 28 日

寫於東湖





社會 / 文化史集刊：台、法霸權史學八十年

2009/11 (november, 2009)

- 8 -





搶救邊緣：象牙塔外與黑風寨內

盧建榮*

一、弁言

二十世紀九〇年代台灣新文化史歷史書寫運動的出現，挑戰了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導的既有史學體制的正當性權威地位。這一波新史學浪潮究與台灣文化環境和史學的學術風尚產生何等互動與糾葛，不能不令關心歷史書寫文化和學術社會實踐的有心人士正面以對。恰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年登八十髦年的此刻，台灣史學的前景與絕大多數史學從業者能否掙脫史學體制的控制牢籠更是息息相關，是輪到史學新世代對下一輪史學新世紀作出承諾的重大關頭。

二、中國／台灣史學現代性與史學體制的鞏固

由二十世紀初梁啟超所發起的新史學¹運動，雖說是受到外來學術文化資源的刺激，但施行結果表現出來的卻是難脫針對中國固有史學的前近代風格，而非追模西方現代史學典範，在這個內在變革大於迎頭趕上西方史學大國的大方向上，迭經顧頡剛、傅斯年、陳寅恪等人改造方案²的提

*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

¹ 參見黃進興，〈中國近代史學的雙重危機：試論「新史學」的誕生及其所面臨的困境〉，《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第6期（1997），頁263~284。按：梁氏拈出「新史學」一詞，時為1902年。參見氏著，《新民叢報》1號，頁42~48。

² 參見羅志田，〈向常見史料回歸：北伐後史學取向的一個轉折（一）〉，1998年中研院史語所演講稿。



出，究其實質，距離橫向的廣大國際史壇其專業史學的革新性格³，還有好大一段路要走。但這一點常為台灣史學界冥頑不靈的義和團主義淡化為國情不同、而橫遭漠視。戰後的兩位史學意見領袖都對史學研究對象和性質提出新的宣言，分別見於有先後傳承關係的兩個史學論壇刊物上。⁴ 前者

³ 西方自古即有史學學科，惟史學革命起於十九世紀下半葉，以大學設講座、民間學會的組成、以及專屬刊物的出版，作為重大指標。此參見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 1973, 1987), 頁 136。1856 年 Alexis de Tocqueville (托克維爾) 出版 *The Old Regime & the French Revolution* 一書，可說為西方現代史學第一波革命吹起號角。同時間的中國魏源出版《海國圖志》，意義不在進行史學革命，而在認清世界大勢下，鼓吹國家富強的政治論述。總之，中國現代式的史學革命要比西方的晚約半個世紀，而且還是邯鄲學步的四不像呢。這一波中國史學的弄潮兒，以傅斯年為代表，既不知托克維爾為何許人，也不知馬克思史學的精義（按：有異於 1949 年中共建政後所傳的庸俗化馬克思史學），只學舌了蘭克史學的一句口號：「史料即史學」，卻未悉蘭克史學其敘述史學的底蘊。西方史學在 1950 年代後進入第二波史學革命，傳承自傅斯年學術遺產的台灣史學體制依舊不動如山以迄二十世紀 90 年代。

⁴ 參見余英時，〈史學評論·代發刊詞〉，《史學評論》創刊號（台北：華世出版社，1979 年 7 月）、杜正勝，〈什麼是新社會史〉，《新史學》3:4 (1992, 12)〔台北：編輯部設於中研院歷史語言所〕等兩文。先講前文，它針對的是中國史學界於改革開放前套公式、找歷史律則這一學術風尚。此文另有英文版，於 1982 年刊出，2008 年台北聯經出版社委由李彤譯成中文，收入《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一書中，頁 89~114。比較 1979 年版和 1982 年版大體相仿，惟在適應中、英文讀者處，有些微差異。而且，英譯版會收在論中國史學的集子中，益發見得此文是針對大陸史學界，而非台灣史學界。講到後文，請注意該文作者於頁 115 有云：「新社會史的主要內涵應以探索該社會的文化為職志，從物質文明到精神文明。」標舉的是以文化作為研究課題，值得注意。杜的作為另一層意義是，為宣布所要作領域取得正當性之意圖。但同時，有將不同課題領域予以邊緣化的謀略。類同作法之前有張玉法、之後有林滿紅，惟均屬非權力核